

郎咸平
X
楊瑞輝

郎咸平 楊瑞輝◎著

新解《資本論》
與《國富論》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郎咸平

1986 年從沃頓商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87 年在大師 Robert Litzenger 的帶領下共同提出“托賓的 Q 大於 1 是好公司，小於 1 則是壞公司，壞公司發放股利對股民而言是好消息，股價會上升，但好公司發放股利與否卻不會影響股價”。基於這一發現，郎咸平教授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發表三篇論文，其引用率在全世界金融學論文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1990 年間所有出版的金融論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就是郎咸平與助教 Stuart Gilson 合著的《不良負債重組與公司私下重組的實證研究》，這篇文章還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 50 篇金融學論文。另外一篇題為《管理業績、托賓的 Q 和成功收購要約獲得的收益》的文章同時被列入全世界公司財務引用率最高的 28 篇論文。1990—1992 年間，郎咸平在 *Journal of Finance* 和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發表有重要影響的論文 6 篇。

1994 年，郎咸平教授離開紐約大學轉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同年，郎咸平教授和 Rene Stulz 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發表了《托賓的 Q、公司的多元化經營、公司業績》一文，這篇文章對學術界有相當震撼力，因為郎咸平教授提出了一個反思維：公司多元化經營是有害的，我們應該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篇文章是針對美國企業所做的研究，但其結論給中國國企大量亂投資的現象當頭棒喝。

1997 年之後，郎咸平教授將重心轉移到亞洲公司的課題研究。1998 年赴美國華府參與一項亞洲公司治理的研究，研究成果標題為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Heroes or Villains*，該論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ISBN: 0-8213-4631-8)。之後，郎咸平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亞洲公司的重要論文，2000 年在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發表《東亞公司中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2001 年發表《股息和利益侵佔》，2002 年發表《大股東激勵與壁壘效應解析》，2006 年發表《大股東持股對於信息不對稱和股票流動性的影響》等論文。

楊瑞輝

楊瑞輝 (Leslie Young) 教授出生於廣州，兩歲時隨父母移居新西蘭，在惠靈頓附近的廣東人社區經營蔬菜農場。每天幫父親裝卸蔬菜後，他都會跑到惠靈頓市立圖書館學習英文。他喜歡英國詩歌、戲劇和小說，而且會將所有看過的書抄寫一遍，由此培養了他對世界各國文化、歷史和哲學的愛好。

楊瑞輝數學天份很高，本科就讀於惠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 (Victoria University)，主修數學，獲得優等理學學士學位。之後，申請去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在等待去牛津大學的時間裡，楊瑞輝便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將數學分析的方法應用於拓撲學。維多利亞大學的教授得知以後，非常希望他留在學校繼續進修博士。不過此時的楊瑞輝又已經完成了另外一篇博士論文，將數學分析的方法應用在泛函分析中，此論文最終還獲得了“高等數學研究獎”。楊瑞輝的這兩篇學位論文都完成於 20 歲前。最終楊瑞輝仍然選擇了牛津大學。2003 年，維多利亞大學授予了他當年未能被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

在英國牛津，楊瑞輝完成博士學位後便申請英國國籍。申請期間，他有幸結識了後來 (1996 年) 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James Mirrlees)。在莫里斯教授的影響下，他開始接觸經濟學，並得以在牛津的林肯學院任教。這之後，楊瑞輝回到了新西蘭。7 年之後，他被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聘為紐豪斯 (V. F. Neuhaus) 金融講座教授和經濟學講座教授。

楊瑞輝在國際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被界內人士廣泛認同。其著作《黑洞關稅和再分配的內生性理論》一書 (劍橋大學出版社)，贏得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諾貝爾評委會主席的好評。而且，楊瑞輝在國際最著名的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史無前例地連任四屆編委會成員。

1992 年，楊瑞輝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偉倫財務學講座教授（Wei Lun Professor of Finance），並且從 1993 年開始，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商學院的執行理事，負責教育工作。楊教授擅於對比西方經濟和日本及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尤其關注經濟發展中經濟組織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根源。

Contents

目 錄

前言一	只有徹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維， 中國才有希望（郎咸平）	12
前言二	馬克思主義蘊涵了20世紀很多 主流經濟學理論（楊瑞輝）	19
Chapter 1	亞當·斯密的社會主義情懷	21
1	導言：不要忽視亞當·斯密的思想基礎——反腐敗	22
2	亞當·斯密的社會主義情懷	25
	1. 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26
	2. 亞當·斯密對大英帝國主義的批判	32
	3. 亞當·斯密利用“看不見的手”對抗資本主義的腐敗	35
3	新古典經濟學是如何扭曲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	37
	1.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革命	38
	2. 新馬克思主義的短暫光輝	44
4	中國的亞當·斯密——司馬遷	48
	1. 司馬遷首先提出“看不見的手”	48
	2. 中國點亮西方現代文明之火	50
	3. 司馬遷與老子	55
	4. 司馬遷直接影響了亞當·斯密嗎？	56

5	結論：批判官商勾結是《國富論》的核心論點	62
Chapter 2 馬克思：共產主義與和諧主義		65
1	前言：是胡適誤把“communism”翻譯成“共產主義”？	66
2	馬克思的智慧背景：德國哲學	71
3	青年馬克思心中的和諧社會	79
	1.《黑格爾國家學說批判》：抽象的規則破壞了社會和諧	81
	2. 批判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抽象的財產和貨幣使人們之間變得冷漠	86
	3. 經濟學哲學手稿	93
	4. 馬克思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論猶太人問題》	98
	5. 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導論	99
4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與具有深遠影響的 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	105
Chapter 3 歐洲的歷史就是一部透過民主與法治 反腐敗的階級鬥爭史		111
1	引言	112
2	封建社會的崛起	113
	1. 法蘭克人侵略歐洲建立了一人統治的封建社會	113
	2. 海盜的掠奪成為貴族瓜分國王權力的第一個因素	114
	3. 馬鐙成為貴族瓜分國王權力的第二個因素	117
	4.《大憲章》將契約帶入了金字塔政治系統	119
	5. 利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史觀解釋民主和法治的產生	122
	6. 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場戰爭——玫瑰戰爭， 孕育了腐敗的亨利八世	123

7. 腐敗的亨利八世和貴族透過掠奪教會剝削農民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章所關注的第一個主題	127
8. 火藥的引入使得資產階級萌芽了	128
9. 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論解釋這段歷史	130
3 資產階級的崛起	131
1. 英國資產階級靠著海上貿易而崛起	132
2. 國王和貴族聯合剝削資產階級和老百姓	134
3. 英國資產階級和國王貴族的內戰	136
4. 貴族利用腐敗的議會剝削	138
5. 圈地運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章所關注的第二個主題	139
6. 資產階級的革命——《改革法案》	140
7. 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論解釋這段歷史	142
4 無產階級的興起	144
1. 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章所關注的第三個主題	144
2. 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論解釋這段歷史	145
3. 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	146
4. 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論解釋這段歷史	146
5. 民主制度的作用是反腐敗	147
5 結論	148
 Chapter 4 《資本論》：透過現代數學的演繹分析	 153
1 《資本論》第一卷	155
2 《資本論》第二卷	156
3 《資本論》第三卷	160

附錄 I：新古典學派的收入分配理論	163
1. 龐巴維克的“迂迴生產理論”	163
2. “迂迴生產理論”的漏洞	164
3. 克拉克的邊際生產率理論	166
附錄 II：森島通夫對資本積累過程不穩定性的證明	170
附錄 III：“價值”轉化為“價格”的數學推導	174
1. 商品的“價值”	174
2. 商品的“價格”	175
3. “價值”向“價格”的轉化	176
4. 資本利潤率的下降趨勢	176
Chapter 5 資本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改革	179
1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一：一部分人財富增加， 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	180
2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二：透過嚴刑峻法、阻斷官商勾結 和內部交易，保證社會基本公平	182
3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三：藏富於民	192
4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 但其他人不能更貧窮	198
5 改革：不能圖利少數人，而成本由全社會來承擔	200
參考文獻	219

只有徹底切割非“左”即右的 僵化思維，中國才有希望

郎咸平

各位讀者可能會覺得很納悶，我和楊瑞輝教授，作為喝著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經濟學家，怎麼會寫這本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小冊子。其實理由很簡單，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以自由經濟思想主導的三十多年經濟改革的結果，促使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研究馬克思的相關理論，反思中國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徑選擇。

我對馬克思的理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實我從大學就開始慢慢接觸馬克思理論，可是由於水平有限，一直無法領略其思想的本質。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我修了一門一位德國教授 Alois Wenig 開的資本理論（Capital Theory）課程，我很震驚地發現這位教授竟然用多變量微積分解釋《資本論》，而且 Wenig 教授就把馬克思的理論當成經濟理論教學，這位德國教授在課堂上告訴我們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當時覺得德國人自己追捧德國

人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還是領略不到馬克思的思想本質，只是更進一步地了解了《資本論》可以用數學來解讀。期末考試的時候，這位教授出考題要求我們用數學解答《資本論》的幾個問題。不瞞各位讀者，我們全班同學，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答對任何一題。最後 Wenig 教授要求我們全班補考，我只得了 35 分，這門課的成績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較客氣，沒把我們全班給當掉。以後我請求這位教授幫我寫推薦信申請美國的大學，教授很客氣地對我說，我很願意幫你寫推薦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請二三流的學校。所以我能進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頓商學院讀書是一個我到現在都不能解釋的奇跡，至少教過我的老師都是這麼認為的。不過命運就是這麼有趣，我在紐約大學教書的時候，Wenig 教授也到紐約大學訪問，他看到我時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學生的興奮之外，我還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進入沃頓商學院以後，經常在經濟系修一些經濟學的課，當時我想去修兩門課程，一個叫經濟思想史，一個叫中央計劃 (Central Planning)。可是開課第一週我就打了退堂鼓，因為數學之難、理論之艱深讓我感到痛苦萬分，可我還是決定旁聽一個學期，當然馬克思的理論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題。由於我本身的水平實在有限，我當時只能對馬克思理論進行技術性數學化的理解，而完全無法參透其中的玄機。我當時就已經了解了三卷《資本論》的理論幾乎都在 1950 年之後得到了西方經濟學家的證實，而這也

是我這本書的主題之一，就是向各位讀者介紹如何用現代經濟理論和數學解讀《資本論》。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是現代經濟學竟然證明了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的正確性。

我拿到博士學位的二十多年後，整個學術理論體系逐漸成形，我對於馬克思的理論精華也漸漸地開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經常和同事楊瑞輝教授喝茶討論馬克思。楊教授的知識非常淵博，我從和他的持續對話中終於理解了為甚麼對話（dialogue）這麼重要，這也是柏拉圖對話集的重要意義，因為相互的對話、討論、激辯才能形成辯證（dialectic），我也開始慢慢地理解了馬克思承襲康德、黑格爾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辯證法。我們在這本書中將馬克思這一脈相承的哲學思想以最簡單的方式介紹給讀者，而且以此為基礎，我們開始討論從馬克思年輕時代始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甚麼。我們查證資料發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他想達到和諧社會的一個手段，他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但是當我讀完他的著作之後立刻有了一個疑問，以馬克思的聰明才智而言，難道他真的相信透過共產主義可以達到和諧社會的目的嗎？帶著這個疑問，我們研究馬克思從年輕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後發現，他年輕的時候是個充滿激情、樂觀的年輕學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兒女的過世讓他難以承受打擊，性格開始轉向悲觀，而且痛恨命運的無情，甚至痛恨

他晚年所經歷的資本家的貪婪霸道。最後，他從根本上放棄了改革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就是資本主義必定滅亡，而由共產主義所取代。但是目前，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滅亡，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老大哥竟然轟然垮台。

難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正確地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嗎？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三卷《資本論》的理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揭示了剩餘價值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而資本家則無情地佔有了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現代經濟學基本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但是馬克思接著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並最終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資本論》第二卷指出資本逐利的天性一定會導致再生產失衡和經濟危機，馬克思的這個觀點後來也被經濟學家證明是正確的，而且資本主義確實也發生了危機，例如 1929 年經濟大恐慌和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但這些危機絕不足以說明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資本論》第三卷指出資本家必然進行越來越多的資本密集型投資，從而導致利潤率的必然降低，這個觀點也在日後被證明是正確的。不過，在現代社會，持續的創新可以享受高額利潤率，直到更多人跟進模仿，然後行業利潤率才下降，因此美國就是透過不斷的創新，例如互聯網，維護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因此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說法只存在於《資本論》第一卷，可是馬克思並沒有意識到他過世之後，資本主義

透過進一步的民主與法治保護了工人的利益，從而避開了《資本論》第一卷的詛咒。

我實在很難想像，馬克思這麼嚴謹的學者竟然沒有用他的唯物辯證法推理出民主與法治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崩潰。經過我們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這樣的結論的。所以在此書中，我們想重塑一個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資本論》所談到的歐洲的歷史，希望能夠重新塑造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為何資本主義能持續領導世界。我們詳細分析了歐洲一千多年的歷史之後，替馬克思得出了一个驚人的結論，那就是——“現存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是通過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來遏制腐敗的階級鬥爭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就是因為在馬克思過世之後，歐洲透過了更進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敗，從而挽救了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而蘇聯的解體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有甚麼錯誤，而是因為蘇聯沒有遏制腐敗，違反了馬克思的理論。

當然，談到馬克思就不能不談亞當·斯密，他被譽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重新閱讀《國富論》之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震驚不已。斯密應該重新被定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來源之一。當時英國龐大的資本家集團腐蝕了英國的議會以致通過了許多壓抑勞工、圖利資本家的議案，同時英國的資本家透過大英帝國的擴張，掠奪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國的子民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因此亞

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如同馬克思一樣痛斥資本家剝削工人，他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的貪婪摧毀了資本家的靈魂。同時，和列寧一樣，他也譴責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國主義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嚴重剝削。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資本主義，反而表現出像馬克思一樣的悲天憫人的胸懷，他反對政府腐敗地使用政治權力，認為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所以個人追求利益的行為，就能使得整個社會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經濟舞台，不要干涉經濟的自然運作。

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亞當·斯密的理論之後，發現兩個偉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類似，馬克思透過“民主和法治”打擊權力的腐敗，而亞當·斯密則是透過“看不見的手”打擊權力的腐敗，但是這兩位悲天憫人的大思想家打擊權力腐敗的終極目標都是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和諧的社會”，而亞當·斯密稱之為“社會整體利益”。請問各位讀者，這兩位學者到底誰是右派，誰是“左派”？這麼看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所謂的“左”和右的爭論是多麼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當做目的的僵化思維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馬克思為例，把他的共產主義手段當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諧社會的目的，從而造成了改革開放之前無民主、無法治的“左”的錯誤，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僵化，破壞了社會的和諧。但是對於

改革開放之後橫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的右派而言，他們把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當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會整體利益。例如，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市場都沒有全面進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公共部門，而在中國，在新自由主義的誤導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產品部門，從而造成了房改之後住不起房、教改之後上不起學、醫改之後看不起病的社會不公現象。而這些改革的結果忽略了亞當·斯密的社會整體利益，圖利了少數人，而改革的成本卻由全社會來承擔。我們必須打破這種錯誤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維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羈絆，這也是我們寫作這本小冊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錯亂思維，在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和諧社會和亞當·斯密的社會整體利益呢？其實對於不同的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也應該有著不同的階段劃分，以現實意義而言我認為應該以“追求公平”為現階段的執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礎上，才能追求效率。講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貧窮。只有這麼做才能達到馬克思的和諧社會和維護亞當·斯密的社會整體利益。為了闡釋這個理念，我特別把我 2005 年 12 月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放在本書中，這是我第一次提出這個思維。

2011 年冬於上海

馬克思主義蘊涵了 20 世紀很多 主流經濟學理論

楊瑞輝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是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剩餘價值的本質，並且預言了資本主義必然會因為其內部矛盾而產生危機。馬克思主義也因此成為 20 世紀世界革命運動的指導思想，深刻而永久地改變了世界歷史。

馬克思的貢獻還不止於此，他對後世的思想理論產生了持續而廣泛的影響。得益於其年輕時的哲學和社會學基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始終站在一個更高的視角上。馬克思晚年主要在整理《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詳細而系統地分析了野蠻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兩卷不僅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蘊涵了 20 世紀的很多主流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只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必經階

段，終究逃脫不了滅亡的結局。在資本主義世界裡，資本家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另一方面為了節約勞動成本而加大資本投入，這終將導致勞動和資本的關係難以維繫，最終迫使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金融系統趨於崩潰，並將原本勤勞善良的人類扭曲成為瘋狂追逐抽象資本的邪惡物種，整個社會將因此而陷入黑暗，整個人類將因此而失去尊嚴。我們目前經歷的這次經濟危機恰恰證明了馬克思當年這一可怕但極富智慧的預言。

雖然馬克思的理論不可能字字無誤，但是他對歷史的洞悉可能是最廣泛最深入的，他對未來的預言也可能是最樂觀最慈悲的。

馬克思無疑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2011 年冬於香港

Chapter 1

亞當·斯密的社會主義情懷

1 導言：不要忽視亞當·斯密的思想基礎——反腐敗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英雄人物，他不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更堪稱現代資本主義之父。舉例而言，美國前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時期，為政府服務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還設計並佩戴印有亞當·斯密肖像的領帶，可見亞當·斯密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影響力之大。亞當·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現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大體系之一——自由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另一個由馬克思理論所孕育的蘇聯東歐等國家卻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衝擊下逐步解體了。

但是我們在重新閱讀這本開現代自由經濟思潮和現代資本主義先河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感到震驚不已：亞當·斯密的思想應該重新被定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淵源之一。亞當·斯密時代的英國是處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龐大的資本家集團腐蝕了英國的議會而通過了許多壓抑勞工圖利資本家的議案，同時英國的資本家透過大英帝國的擴張掠奪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國的子民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因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如同馬克思一樣，痛斥資本家通過操縱和賄賂政客來剝削工人；他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的貪婪摧毀了資本

家的靈魂。同時，和列寧一樣，亞當·斯密也譴責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也遭受了嚴重剝削。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目的在於反對在經濟生活中腐敗地使用政治權力，他認為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所以個人追求利益的行為，就能使得整個社會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經濟舞台，不要干涉經濟的自然運作。故此他把此項（經濟學）研究領域命名為“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馬克思所處的德國（普魯士）的情況和英國差不多，只是德國當時不像大英帝國擁有多處殖民地，因此馬克思只針對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議題展開批判。可是馬克思本身是位哲學家，他的思想承自康德、黑格爾等大師，他從哲學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他指出，當時所謂的現代國家是由一系列抽象規則所組成的，而老百姓之所以願意接受這些規則主要是因為私有財產制度，一旦產生產權糾紛，社會大眾就可以透過這些規則解決爭端，從而保護私有財產。但是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議會制度的批評竟然和亞當·斯密如出一轍，他也認為資產階級腐蝕議會建立圖利資本家的規則，進而奴役勞動者。馬克思對勞動者的慘況批判和亞當·斯密又是如此之類同，他指出抽象的私有財產使得人們之間變得疏遠、冷漠，同時也惡化了人際關係。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們把他們的勞動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資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剝削的對象、掙錢的機器。那麼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題呢？馬克思的解決方法不同於亞當·斯密，他認為只有廢除私有財產才能重建和諧社會，而資本主義由於其內在的矛盾一定會崩潰，並最終由無產階級所取代。無獨有偶，馬克思也將這些研究稱為“政治經濟學”。

這兩位偉大的學者同樣看清楚了資本主義的官商勾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團體，進而奴役勞工的事實。而馬克思更為深刻地描述了專家學者在當時的態度，他指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巧的爭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亞當·斯密以及馬克思的理論精髓就是要打破這種腐敗，只是路徑的選擇不同。在 18 世紀的英國，亞當·斯密選擇了“看不見的手”，而在 19 世紀的德國，馬克思選擇了“無產階級革命”，但其透過反腐敗而重建和諧社會的目的卻是殊途同歸的。

所以，今天我們應當警惕某些人高唱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倡導其所謂的強化私有制和市場力量。我們千萬不要被其片面言論所欺騙，而忽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所熱切關注的腐敗問題。如果放任利益集團透過“看不見的手”而獲得操縱價格的權力，那麼這兩位大學者所擔心的老百姓的慘況也就為時不遠了。今天我們呼籲政府強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走回頭路去研究“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綱領，而是研究他們這種悲天憫人

的社會主義情懷，進而理順 21 世紀的中國所需要的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

2 亞當·斯密的社會主義情懷

亞當·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任教，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大師，他似乎不甘心當一位偉大的學者，因此他在退休前竟然牛刀小試任職於蘇格蘭海關稅司，這是個有趣的職業轉換。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學講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和關於道德的論著《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他的不朽巨著《國富論》出版於 1776 年，這本書開創了現代經濟學之先河，亞當·斯密堪稱現代經濟學之父。但是歷史的巧合就是如此的有趣，《國富論》和標誌美國建國的《獨立宣言》恰巧在同一年出版。而這個巧合所以如此的出名，主要還是因為在這一年所建立起來的美國實踐了源於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將政府的作用限定至最小，而通過“看不見的手”自我調節。這種思維孕育了以自由經濟為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因此他也堪稱現代資本主義之父。

今天，我們這個世界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體系，一個是由馬克思思想理論所孕育的社會主義，另一個是亞當·斯密理論所孕育的自由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

1. 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但是歷史就是這麼的諷刺，不要說一般人，就連現代經濟學家好像也沒有多少人真正讀過《國富論》。更為諷刺的是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如果真正讀過《國富論》，他們一定會感到震驚：《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所討論的問題竟然如此之類似！舉例而言，亞當·斯密也關注工人遭受擁有政治權利的資本家的剝削。他指出，一方面英國的法律禁止工人團結起來提高工資，但卻放任資本家壓低工資；另一方面，法律從資本家的利益出發限定了最高工資。通過這些論述，亞當·斯密嚴厲地譴責資本家攫取了英國的民主政治權利：

然而，一些法律有時仍然試圖限定某些地區和某些行業的工資。於是，喬治三世八年的法律，除了在國喪期間以外，禁止倫敦及其周圍五英里以內的所有裁縫雇主支付超過兩先令七便士半的日工資給雇工，違者處以重罰。只要立法機構試圖調解雇主雇工之間的爭議，那麼一定以雇主為顧問

當雇主們串通壓低工資時，他們通常簽署合同或締結協議不支付一定數目以上的工資，違者將受到處罰。如果雇工們組織相反的同盟，不接受低於某一數目的工資，他們就會遭到法律嚴厲的處罰。但是如果法律是公

正的，那麼它也應該如此對待雇主。但是喬治三世八年的法律加強了雇主們串通的可能性^①

Particular acts of parliament, however, still attempt sometimes to regulate wages in particular trades, and in particular places. Thus the 8th of King George III prohibits under heavy penalties all master tailors in London, and five miles round it, from giving, and their workmen from accepting more than two shillings and seven pence halfpenny a day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general mourning. Whenever the legislature attempts to regul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sters and their workmen, its counselors are always the masters...

When masters combine togeth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ges of their workmen they commonly enter into a private bond or agreement not to give more than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Were the workmen to enter into a contrary combination of the same kind, not to accept a certain wage under a certain penalty, the law would punish them severely; and if it dealt impartially, it would treat the masters in the

① 我必須提醒讀者注意，出於忠於原著作的原因，對本書所有的引用文我只能直譯，而不能意譯，因此讀起來會比較拗口。

same manner. But the 8th of George III enforces by law that very regulation which masters sometimes attempt to establish by such combinations...

亞當·斯密指出，資本家擁有政治權利，因為他們有選舉權，而工人幾乎沒有選舉權。^①而且資本家還有其他的優勢：發生罷工時他們比急等工資養家糊口的工人能堅持更長的時間；資本家人數很少，所以他們共謀對策也比工人更容易。^②

亞當·斯密痛心指出，資本家的剝削和單調沉悶的工廠工作損害了工人的心智與人格：

如果一個人的一生都耗費在幾個簡單的、功能單一的操作上，他就沒有機會發揮他的理解力、運用他的創造力解決難題。他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努力的習慣，甚至衰退到極度的愚蠢和無知的地步。心智的魯鈍不僅使他喪失了興趣和交談的能力，也不會懷有任何慷慨、高尚、溫柔的感情，進而連日常事務也不能處理。對於國家的重大而廣泛的利益問題他完全沒有概念 這種工

①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157—158 頁。

②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83—85 頁。

作甚至損害他的身體功能，使他不再有精力和毅力勝任任何除了正在傷害他的那份工作。他在本行業獲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喪失社會責任感和進取精神為代價。在任何一個進步文明的社會裡，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佔人口主體的貧窮的勞動階層必然會受到上述傷害。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He naturally loses therefore the habit of such exertion, and generally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The torpor of his mind renders him, not only incapable of relishing or bearing a part in any conversation but of conceiving any generous, noble or tender sentiment, and consequently of forming any just judgement concerning many even of the ordinary duties of life. Of the great and extensiv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he i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judging... it even corrupts the activity of his body, and renders him incapable of exerting his strength with vigour and perseverance, in any form of employment than that

to which he has been bred. His dexterity at his own particular trade seems in this manner to be acquired at the expence of his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martial virtues. But in every improved and civilized society this is the state into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that i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ust necessarily fall, unless government takes some pains to prevent it.

這些憂慮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述何其相似！亞當·斯密也同樣關注追逐財富對追逐者自身的傷害：

他用自己的整個一生，來追求他也許永遠不能享受到的那種創造性和優美的生活，為此他犧牲了自己永久而真正的安逸，而且，如果他在垂暮之年最終得到它，他就會發現，它們無論在哪方面都比不上他業已放棄的那種所謂微不足道的安定和滿足。最後他開始醒悟：財富和地位僅僅是毫無效用的小玩意。權力和財富就像是為了產生肉體上微不足道的便利而設計出來的。他們反而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擔心、恐懼和憂傷，面臨疾病、危險和死亡。

Through the whole of his life he pursues the ideas of a certain artificial and elegant repose which he may never arrive

at, for which he sacrifices a real tranquility that is at all time in his power, and which, if in the extremity of old age he should at last attain to it, he will find it to be in no respect preferable to that humble security and contentment which he had abandoned for it... he begins at last to find that wealth and greatness are mere trinkets of frivolous utility... Power and riches appear than to be what they are, enormous and elaborate machines contrived to produce a few trifling conveniences to the body. They leave him always as much, and sometimes more exposed than before to anxiety, to fear, and to sorrow; to diseases, to danger, and to death.^①

亞當·斯密認為壟斷產生的高利潤傷害了壟斷者，因為這會“破壞商人與生俱來的節儉品質。當利潤增加，這種樸素的美德就顯得多餘，而鋪張奢華似乎更與他的富有相般配”^②。亞當·斯密比較了“富裕階層普遍的雜亂無章”和“窮人嚴格節儉和精打細算”^③。這些敘述讓我們聯想起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

① 參見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第181—183頁；亞當·斯密（Smith，1977），第52頁。

② 亞當·斯密（Smith，1934），第612—613頁。

③ 亞當·斯密（Smith，1934），第48頁。

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中的相關內容，在這本書裡馬克思痛陳資本主義運作對工人和資本家的共同傷害。

亞當·斯密提倡政府應當發揮重大作用，比如提供基礎設施、普及教育。他反對將政府的功能僅僅理解為縱容國內的利益集團通過政治渠道攫取財富，此外還降低了經濟效率。這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核心論點。^①

例如，他再三地抨擊對貿易的不公平的、低效率的干涉。他譴責通過立法給予私人或貿易公司經營某產品的排他權利^②，或者給予同業工會提供某種排他權利^③來確立壟斷。亞當·斯密痛責立法輕易地被資本家操縱，他們人數稀少，集中於城市，而且擁有充足的資金行賄。他抨擊充斥於資本家立法游說活動中的“詭辯和喧囂”^④。今天，他的警告很大程度上依然適用。

2. 亞當·斯密對大英帝國主義的批判

亞當·斯密不但和馬克思一樣批判資本主義，他還更進一步地批判大英帝國本身所實行的帝國主義掠奪政策，這種批判和列

①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452 頁。

②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78—79 頁。

③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79 頁、第 135—140 頁。

④ 亞當·斯密 (Smith, 1934), 第 144 頁、第 471 頁。

寧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又極其類似。舉例而言，他批評通過立法建立對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的壟斷貿易，這種壟斷使資本家獲利，卻因為所需的軍事開支貽害國家：^①

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讓它的人民愉快地幻想他們在大西洋的西端擁有一個偉大的帝國。這個帝國迄今只是一個幻影而已，它不是一個帝國而只是一個帝國的計劃；它不是一座金礦，而是一個金礦的計劃。一項需要而且持續需要費用的計劃。如果情況照舊，這種費用將難以估量，而且由於殖民地貿易被大英帝國的資本家所壟斷，因此也不會給人民帶來任何利潤。對於佔人口主體的人民而言，他們是只有損失而沒有利潤。

The rulers of Great Britain have for more than century past amused the people with the imagination that they possessed a great empir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Atlantic. This empire, however, has hitherto existed in imagination only. It

① 亞當·斯密 (Smith, 1934)，尤其是第 60—66 頁、第 612—617 頁、第 946—947 頁。

參考文獻

- [1] Böhm-Bawerk, E., von (1896).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Festgabe für Karl Knies Berlin [trans. P. Sweezy ed.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uge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 with an appendix by L. von Bortkiewicz].
- [2] Böhm-Bawerk, E., von (1894). *Capital and Interest: A Cr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3] Bortkiewicz, L. von (1906). “Wertrechnung und Preisrechnung im Marxschen System”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3, XXIII and XXV [trans.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1952 25-60].
- [4] Clark, J. B., 1908.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 Y.: Macmillan; first printed 1899.
- [5] Domar, Evsey 1946.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14: 137-47.

- [6] Domar, Evsey 1957.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Dorfman, Robert, Paul A. Samuelson, and Robert M. Solow. 1987. reprint.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 [8] Fan, P. T., 1954. "Physiocratic Doctrine in Ancient China" in L. Maverick, ed., *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 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9] Gernet, J., 1982.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R. Fos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0] Groenewegen, P. D, 1977. *The Economics of A. R. J. Turgo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1] Harrod, Roy F. 1948.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12] Hawkins D., and Simon H. A. (1949): "Note: some condi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conometrica*, 17, pp. 245-248.
- [13] Hicks, John R. (1946). *The Trade Cyc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14] Keynes, J.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